

东正教文化影响下巴金作品中的女性崇拜意识

范水平 倪小湑

提 要：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深受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而对巴金的小说创作影响最大的，则是极富俄罗斯特色的东正教文化中独有的女性崇拜的文化传统。巴金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近乎完美的女性人物形象系列，其中所彰显出来的女性崇拜意识与他所受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范水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2006 级博士研究生；倪小湑，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法德文系学生。

主题词：巴金作品 女性崇拜 俄罗斯东正教

在五四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遗产，2003 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①。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巴金在他所有重要的作品当中，都以极大的热情和虔诚的态度，怀着或同情或赞美，甚至是崇拜的心理塑造了一个个几近完美的女神似的女性形象，由此显现了他所受俄罗斯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的重要影响。

遗憾的是，在巴金研究中至今尚无人对此进行过认真的考察。本文即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结合巴金对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接受考察了巴金的作品，并从中发现：正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对巴金的深刻影响，使得巴金在其作品中彰显出独特的女性崇拜意识。因此可以说，不了解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就难以真正读懂巴金的作品，更无法体味巴金作品中一系列完美的女性形象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的魅力。

一、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密切关联

巴金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早有公论，他的小说《家》与《红楼梦》的千丝万缕的精神渊源关系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巴金创作影响更深的还是西方的文学和文化。1979 年巴金在巴黎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Pierre—Jean Remy）采访时说：“在中国作家当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当雷米问他：“有哪些作家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巴金说：“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②。这即是说，对巴金创作影响最深的还是俄罗斯的文学与文化。

早在青少年时期，巴金就疯狂地爱上了俄罗斯的文化思想和文学。他最先接受的是克鲁泡特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对于克氏的《告少年》，少年巴金读得如醉如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

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③从此，巴金疯狂地爱上了克鲁泡特金的那些极富煽动性的小册子，除大量阅读他的作品外，还翻译了他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的自传》、《面包与自由》等著作。实质上，少年时的巴金从无政府主义思想里汲取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从他早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寻到它的踪迹。而这种自我牺牲、奉献精神是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的。成年后的巴金，积极地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亲自为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撰写广告词。无怪乎当今俄罗斯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罗季奥诺夫说：“巴金先生偏爱、珍惜和熟知俄苏文学。”并认为巴金先生是以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为创作航标的^④。的确，巴金的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与屠格涅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评论界认为巴金是“中国的屠格涅夫”。巴金和屠格涅夫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异国作家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形象，其中的一类女性形象是虽身为女奴，却心地善良，甘愿承受苦难，渴望人生幸福的底层女性。在巴金和屠格涅夫的笔下，她们都像是在受难的童贞圣女，这是巴金和屠格涅夫作品共同的旨趣，也是巴金在其作品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接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或许正是这种巴金与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亲缘关系，使得巴金的作品在俄罗斯一直以来受到极大欢迎。据罗季奥诺夫先生统计，“截至 1950 年代末，巴金的代表作都被译成了俄文，其印刷总量（刊物以外）达到了 54 万册。”^⑤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巴金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俄罗斯文化底蕴有十分的相通性，因此十分契合俄罗斯人的文化接受心理。1990 年苏联授予巴金先生“人民友谊”的勋章，也许是最有力的说明。

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文学中的女性崇拜思想

而俄罗斯是个崇尚宗教的民族，是个有信仰的国度。

俄罗斯人原是东部斯拉夫人（后来又叫罗斯人）的一支，在东正教传入之前，罗斯人信奉的是多神教。古代斯拉夫人的多神教观念的基础就是对女性和母性的广泛崇拜。公元 980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尝试改革斯拉夫多神教。后来，由于改革遇阻，弗拉基米尔最终放弃了多神教，于公元 988 年另选基督教作为国教。俄罗斯人在阐释基督教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多神教观念，致使基督教在俄罗斯发生了变异，实现了它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基督教三大分支之一的东正教。实际上，自公元 988 年以来，东正教便逐渐成为了俄罗斯人生活的重心。

多神教遗产中对女性顶礼膜拜的传统观念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圣母贞洁的观念相遇合并相互渗透，最终凝聚为对一神教圣母的崇拜。在东正教中，原本基督教文化里女性本源的思想被发挥到极致。“东正教和天主教还十分崇拜玛利亚，尊为‘童贞圣母’”^⑥。相对于天主教和新教而言，东正教在教义上特别重视和强调的一条便是：“特别崇拜童贞女玛利亚，她在东正教会的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东正教推崇圣母玛利亚在天堂里的地位和与圣子的亲密关系——孕育并生养了他。东正教徒经常向她做祈祷，赞美她，希望求得她的保佑和帮助”^⑦。如果说基督教主要崇拜的是圣子耶稣，东正教则主要崇拜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孕育了世间的一切，并护佑了尘世中的一切生灵。而且，玛利亚还是智慧的象征，她的聪明才智化解了人间的一切灾难和痛苦。

曾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文学的最突出特征是它的宗教色彩。大多数俄罗斯文学家的创作主题都涉及宗教问题。19 世纪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顶峰，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列昂季耶夫和托尔斯泰就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包含着深刻的宗教思想。”^⑧由于原古斯拉夫人多神教传统中的女性崇拜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崇拜及其世俗化的影响及宗教哲学中的索菲亚学说中对于永恒女性的崇拜，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崇拜便演绎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在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当中，一个个崇高而完美的女性形象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文学的神圣殿堂里熠熠生辉，如塔吉雅娜、叶莲娜·斯塔霍娃、索尼亚·玛尔美托娃、阿纳斯塔娅·费利波英娜、安娜·卡列尼娜、拉莉萨……这些形象都是男性作家们倾力塑造的。她们美丽、善良，她们隐忍、宽容，她们历经磨难而富有魅力；她们集合了几乎所有俄罗斯民族优秀的品质。“在将多神教的‘女神’、‘索菲亚’、‘圣灵—圣母’、‘大地母亲’、‘俄罗斯祖国’等概念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俄罗斯文化孕育出对女性和母性的广泛崇拜。这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文学中对尘世爱情的圣化：女性形象蕴涵了更多的圣洁、神秘和深沉。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对‘永恒女性’都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很多女性形象都是对这一原型的改写和翻新。”^⑨而这个原型就是童贞圣女玛利亚。在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玛利亚似的受难和献身的伟大与崇高及智慧的闪耀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巴金作品中东正教式的女性崇拜意识

东正教文化中的女性崇拜，也导致了男性世界对于女性的完美性的期望和依赖，恋人、妻子，往往同时也是他们的母亲，是他们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作为一个反封建的文学战士，在激烈反对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非人的压迫和毒害与崇拜颇具俄罗斯特色的东正教文化之间，巴金在对于女性的崇拜和赞美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契合点。他在回答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的自白中，就曾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那种为信仰而献身的女性的崇敬和赞美：“基督教的处女在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即来的灭亡，并没有一点恐惧，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巴金并因此认为，“她们是幸福的”^⑩。巴金的“‘女神情结’”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在巴金那里，女性是美的化身，善良和纯洁的标志；是母亲和母爱的象征。甚至在巴金晚年的作品《怀念萧珊》等散文中，你还可以看到这种“‘女神情结’”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巴金笔下的女性人物除了陈姨太等特例外，大都是作者所讴歌与赞美的对象。”^⑪

在巴金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温驯奉献型的，这类女性纯洁、坚贞、而柔弱，但为了保护自己所深爱的男性，不管是否值得，都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以鸣凤、瑞珏、梅为代表。另一类是思想开放、聪慧引路型的，这类女性往往比她们身边的男性更有觉悟，更加坚强，更有魄力，比男人还有男人的气概，她们是自己深爱的男性寂寞时的恋人、前进路上的精神领袖，以李佩珠、张文珠、李静淑为代表。而不管是哪一类女性形象，巴金几乎都是站在一个欣赏、崇拜、赞美的角度上来塑造她们的完美。

鸣凤、瑞珏、梅等的死，一致被学术界认为是巴金向封建社会的控诉状。也许因为巴金自己曾在多种场合表达了这种反封建的立场，所以，我们一直跟着巴金去抨击万恶的封建社会。但应该指出的是，巴金在作品中创造这些女性形象反封建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在文本的真实的叙述当中，其实，这些美好的女性，几乎都是为了自己所爱的男性（那些懦弱无能的、或者不大觉悟的男性）而甘愿牺牲的，巴金是带着赞美的笔调来书写她们的爱和献身精神。这些女性，爱得那样彻底、无私而高尚，她们从来只为对方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未来，甚至把生命置之度外。她们爱得义无反顾，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毫无怨言，即使她们的爱人带给她们的只有痛苦。在她们的心目中，她们的爱人永远比她们自己更重要。深爱着同一个人的梅和瑞珏自己都很柔弱，却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高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指责他的缺点。以下是两位女性带有母性的安慰：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梅和瑞珏会在月夜里亲密诚挚地谈心，在她们的心目中，只有爱是崇高的，根本不会是情敌的可能。当瑞珏被逼到城外去生产时，她也只会当着觉新的面前哭，而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当鸣凤发现自己深爱的觉慧并没有理解自己的爱情时，她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埋怨，且为了忠于爱情，她甘愿投湖自尽，临死前，心里想着的还是她心爱的觉慧：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这些温驯、纯洁得象天使一样的美好的女性，她们的爱和献身精神，巴金是非常赞赏的，所以，巴金从来不写她们的反抗，而实际上她们完全是可以反抗的。比如，鸣凤完全可以不去投湖，但是，如果鸣凤不投湖，觉慧就不会那么快地觉醒！在鸣凤死后，觉慧才——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他一把抓住觉民的右手，注视着哥哥的脸。（《家》）

在巴金看来，似乎鸣凤的死加速了觉慧和与觉慧一样的男性精神的成长过程，所以是圣洁的，是值得的。有的学者为此指责巴金的前期小说中鸣凤、瑞珏这些女性形象，是为了“满足男性主人公以及与男性主人公相近的作家确认自我、慰藉自我、纵容自我的需求”^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巴金对于女性崇拜的角度来看，巴金是在以此表现这些女性的圣性，把她们的献身比作是圣母的受难。

在男性精神的引路人一类女性形象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愈加明显。李静淑、张文珠、李佩珠等成为了革命者之后，她们是十分坚定、美好而庄严的。为了表现她们的完美，表现她们集妻性、母性和智慧为一体的圣母似的崇高的形象，巴金往往在她们身边设置了很多病态的、软弱的、不觉悟的男性。在《新生》中，张文珠引用《福音书》上的话进行自喻：“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以此来呼唤徘徊犹豫的男性人物李冷跟从自己去革命。女性成了男性的得救之门，可谓是把女性神圣化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巴金常说：“念格非尔是我精神上的母亲，”而李佩珠的明察秋毫、处事不惊“近乎健全的性格”^②则是巴金心目中崇拜的完美女性人物念格非尔在他文学作品中的投射。

无论是温驯奉献型还是完美聪慧引路型的女性，因为都带有圣性，在巴金作品中的功能，她们都是上帝派遣下来呵护、拯救软弱和不觉悟的男性的天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角色的单一性和相似性，尤其是性格的超级稳定性。如果我们知道巴金在塑造她们时，都是以圣母玛利亚为原型，我们不但不会再对巴金有过多的苛责，相反会对巴金凭添更多的敬意。

《寒夜》中的曾树生是巴金的小说中难得的个性丰富

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曾树生身上，既有奉献精神（在乱世中，为了挑起一家人的经济重担，她甘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自尊，接受大川银行“花瓶”的职位），也有她的玛利亚似的的受难（婆婆恶毒地羞辱她、损毁她的人格；儿子漠视她），更可悲的是她的哭天无门（她的软弱多病的丈夫虽然十分爱她，打心眼里崇拜她，然而，由于他性格的太过软弱和身体的羸弱，无论曾树生怎样引领着他前行，他却一味沉沦，带给曾树生的只有绝望）。曾树生出走后汪文宣的迅速死亡，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巴金的女性崇拜意识：没有女性的精神支撑，男性连基本的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都没有！这是一曲对女性的最崇高的赞歌。不过，巴金向来是在精神层面上接受东正教文化的影响的，他在择用时也是十分清醒的。即便是对于东正教中的女性崇拜意识，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曾树生的出走，可以视作巴金对于女性崇拜意识的超越。作者似乎想藉此表明：男性自身不强大，纵有女性的无私奉献、牺牲和聪慧的引领，也是无济于事的；圣母似的女性拯救男人、拯救世界固然重要，同时也应该救赎曾经遗忘自我的灵魂。

丘特切夫曾说：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尺度无法把她度量；因为她有独特的身材——对俄罗斯，只能有信仰。我们也可以说，用理性无法理解巴金，尤其无法读懂巴金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旨喻，阅读巴金，我们要有信仰，至少我们要熟知俄罗斯东正教独特的女性崇拜的文化精神。

（责任编辑：甘 棠）

①《国务院关于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决定》，国发[2003]27号，载《国务院公报》2004.1.原文是：“巴金是人民的作家，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为贯彻落实发展先进文化的时代要求，弘扬巴金的崇高精神，国务院决定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②《大公报》，香港，1979年7月1日、2日。

③巴金《我的幼年》，《巴金选集》（第十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5页。

④⑤【俄】罗季奥诺夫《巴金研究在俄罗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

⑥张达明《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⑦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⑧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3页。

⑨梁坤《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⑩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见刘西渭《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28—29页。

⑪沈庆利《试论巴金作品中的女性崇拜》，载《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总第141期）。

⑫李玲《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⑬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巴金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0页。